

剖析雷根主義之理論基礎

洪秀菊*

- 一、雷根主義
- 二、霸權主義
- 三、反共產主義
- 四、反恐怖主義

本文主要目的在剖析雷根主義之理論基礎，其基礎建立在霸權主義、反共產主義、反恐怖主義、和雷根經濟學之上。

雷根主義，戰略上一反卡特政府，主張美國強權，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爲了扭轉美國頹勢，追求霸權主義，特別是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強權，爲雷根推展外交工作之所最愛。反共產主義和反恐怖主義，則是恢復往日圍堵政策，抗衡蘇聯復甦的共產勢力，並且抵檔第三世界之恐怖主義政策和反美活動。

結論，作者發現雷根主義之理論部分有其優先順序，其理論大部份來自學術界研究的建議和批評，從整體理論來看，最重要的，雷根爲美國人民創造一種心理上的權力現象，特別是假借雷根經濟學所謂巫毒經濟學所帶來的雷根革命爲然。

關鍵詞：雷根主義、霸權主義、反共產主義、反恐怖主義、反美主義、雷根經濟學、巫毒經濟學、供給面經濟學、雷根革命、圍堵戰略

二十世紀末，在全球軍事經濟勢力普遍衰退的過程中，蘇聯共產政權分崩離析，加盟國紛紛獨立，形勢逆轉，致令俄國陷入四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內外交困。美國改朝換代，縱令民主黨入主白宮，克林頓政府礙難改善經濟頹勢，擋不住日益惡化的預算赤字。

雙方膠著困頓中，昔強今弱，相形之下，不禁讓人懷念雷根的強權主義政策。雷根真的有如大家想像的那麼強嗎？還是僅止於虛張聲勢？人人是不是都需要強者？或者強者會給國民帶來安全感、成就感？和意想不到的衝擊力。什麼時候我們需要強勢的領導？強勢政府是不是就是好的政府？到底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領袖？

不管史家給予雷根什麼定位和評價，雷根的強，雷根任內的強權作風，均勢在必行，主客觀絕不容許他弱。而真能壯大雷根政府聲勢的不外下面兩點：

(一)迷信權力。權力有心理的和運作的權力，權力是比較而來的，心理、運作權力追求到極點，超越他國，且進行干預和影響的，即爲霸權。雷根在國防軍事和政治經濟上，表現他的權力。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副教授

(二)對抗外交。挾此霸權從事於鋼砲外交，對抗共產政權和恐怖集團，視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為其真正的和最後的敵人，並把戰略地區從歐亞大陸擴展到第三世界。

世界多數國家因勢力衰退，獨雷根政府迴光反照，布希政府坐收漁翁之利。本文為一窺究竟，探析強勢的雷根主義政策，先澄清雷根主義之所以為雷根主義，其概念底下的真正意涵，然後針對雷根主義所延伸出，所含蓋所奠基之霸權主義、反共產主義、反恐怖主義，逐一論述政策制定背後的理論依據。

一、雷根主義

基本上，大多數美國總統一上台，都有一套主張，做為其施政理念，特別在國家多事之秋，此種主張和理念更為彰顯。舉其著者，門羅主義的孤立政策，抵擋歐洲到強的覬覦和併吞；林肯的南北戰爭，以解放黑奴為職志；羅斯福總統領導新政，解決二次大戰期間經濟不景氣。杜魯門主義的圍堵政策，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尼克森主義的低盪政策，旨在降低兩極對抗；卡特人權主義，大半關懷第三世界國家。

循著行為科學「刺激—反應」的心理學說，和公共政策「問題—解決問題」法則為準據，體察雷根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便大致可以瞭解雷根的對策，此對策權稱為雷根主義。

「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並非雷根本人命名，而是政論家柯若江姆(Charles Krauthammer)為求一致性，將雷根的所作所為，統稱為雷根主義^(註一)，而廣為流傳。其實有人不喜歡用雷根主義，倒喜歡用「雷根現象」(Reagan Phenomenon)，代表美國自由傳統，新保守主義的抬頭^(註二)，和杜魯門主義圍堵政策的復甦^(註三)，以及對尼克森主義低盪政策和卡特人權外交之反動^(註四)。此種現象和趨勢，不僅始於雷根，雷根任內，而且普及於美國多數人，為一代人之心聲。

雷根主義也好，雷根現象也好，都只是個反應和解決問題之道，重要的是刺激和產生公共議題。雷根之所以當選，和當選以後所面臨的問題，除了內政的經濟蕭條之外，歸結有：伊朗革命推翻巴勒維(Shah Mohammed Riza Pahlevi)君主專制政權，尼加拉瓜桑尼政權推翻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政府，蘇聯侵略阿富汗，美國伊朗四百四十四天的人質危機。無不使美國決策當局甚感棘手，而不得不更深一層地考慮：

第一，失去伊朗，失去尼加拉瓜，失去阿富汗，就如同當年失去中國大陸，失去越南一樣隱隱作痛。美國真的不行了嗎？卡特政府表現無能，是否再度證明，美國勢力真的衰退？

第二，冷戰真的結束了嗎？七〇年代，美國放下身段，降低道德尺度，換來的竟是共產政權的凌厲攻勢，使自由民主集團兵敗如山倒，值得嗎？

第三，在第三世界爭奪戰中，美國不僅敗北，反而引出另一股反美勢力—恐怖主義。於雪上加霜，

註一：Christopher C. Demuth, et al., The Reagan Doctrine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7), p:4.

註二：Jeane J. Kirkpatrick, The Reagan Phenomenon—and other Speeches o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3), pp. 3-16.

註三：Christopher C. Demuth et al. op. cit., p. 31. See also Angelo Codevilla, “The Reagan Doctrine: It Awaits Implementation,” and John R. Silber, “Why Not a Kennedy-Reagan Doctrine?” in Walter F. Hahn, ed.,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Reagan Doctrine,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Institute, 1987), p. 297-299.

註四：Terry L. Deibel, “Why Reagan is Strong,” Foreign Policy, no.62, (Spring 1986), P. 117.

腹背受敵之處，美國如何以有限的國力，殺出重圍，令白宮主人雷根及其智囊團，絞盡腦汁，備受考驗。

雷根主義必須放在這三大問題、三個層面來考量。雷根式的強勢作風、雷根的冷戰、雷根的對抗、雷根的圍堵、和雷根的干預，全在重振美國雄風，破除中美洲「共產」心腹大患，反制中東「恐怖」癌細胞之蔓延，雷根主義之所謂雷根主義，在此。以下剖析雷根主義的霸權主義、反共產主義、和反恐怖主義。

二、霸權主義

國力不行是真的國力不行？還是主觀的壓抑和限制？如果純粹刻意設限，就調整步伐，貫徹權力意志。如果真是國力衰退，究屬相對衰退？還是絕對衰退？

為了避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杜魯門總統在歐洲東西柏林、東西德，亞洲韓戰、中國內戰戰場上，均採取戰略和權力的自我限制，此戰略思想影響所及，甚至到六〇年代越戰，限制目標，沒有贏的意願，美國國力無從發揮，乃至鎩羽而歸。為了降低兩極對抗，七〇年代尼克森的「低盪」、卡特的「人權」，無不在克制美國國力。

雷根執政當初，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為美國的國力把過脈，他認為美國國力是衰退，這種衰退就過去十年（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而言，是一種相對衰退。除了主觀「有國力不用國力」的態度導致弱化國力之外，還有六個衰退的原因：①越戰症候群，②蘇聯擴充軍備，③世界能源短缺，④美國經濟生產力降低，⑤宇內競爭的經濟優勢國相繼崛起，⑥晚近愈發控制不住詭譎多變的世界政治局勢。前四個是短期的原因，後兩個是長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可以克服，長期的原因難以招架。^(註五)

依筆者之見，六個原因中有三個導因於經濟的衰退和重組，可見經濟已成為評估國力的重要指標。主觀上對權力的限制可以調整，殊不知，整個八〇年代，美國人和雷根本人對權力的需求和國力的提昇，氣勢如虹^(註六)。雷根任內，既然大家都熱烈地追求權力，力圖恢復霸權，現在就看客觀情勢和條件能不能配合的問題。

在美國試圖整軍經武之前，先對「霸權」（hegemony）概念做個理解。霸權用語，最早來自於希臘，指在一個體系內，一個國家以各種不同的方法支配其他國家。美蘇之間使用的霸權或帝國，指的是一個國家權力多於其他國家的一種狀態。吉爾平教授（Robert Gilpin）謂國際系中，一個權力大的國家控制、支配權力小的國家的一種狀態為霸權。^(註七)

上面三種界說，都未談到權力的大小和種類，權力要大到什麼程度才算霸權？要經營什麼樣的權力才能稱霸？多阮教授（Charles Doran）強調軍事武力^(註八)，柯恩教授（Robert Keohane）意

註五：See Joseph S. Nye, Jr., "U. S. Power and Reagan Policy," *ORBIS*, vol 26, no.2 (Summer 1982), p. 392 約瑟夫奈教授研究美國國力日有精進，「相對衰退」是研究美國近代史所得，十年後，受到學界爭相研究世界強權興衰的影響，發現美國處在一種「絕對衰退」的困境中，而著文美國權力的變遷和領導的限制，乃至柔性權力，以對照往日政治軍事武力的剛性權力。雖然不在雷根任內，但本文擬借鏡他們日後的觀點，參雜討論，以為雷根政府決策模式，美伊人質軍售尼游反共軍流產失敗，預做伏筆。

註六：Bruce Russett and Donald Deluca "Don't Tread on M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 1981), pp. 381-399. Terry L. Deibel, "Why Reagan is Strong?" *op. cit.*, p. 108. Alexander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 3 美國國務卿海格在書中提到：「我們的盟邦渴望美國的領導」，領導就意謂著使用權力。

註七：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9.

註八：Charles F. Doran,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Hegemony and Its Afterma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屬經濟優勢^(註九)。其他幾位教授認為要綜合性、多樣性的權力才叫霸權，譬如諾斯和史翠克蘭（Robert C. North and Julie Strickland）認為「全盛時期的霸權，需要工業、商業、金融、政治、和軍事各種權力。」^(註一〇)高德斯坦教授（Joshua Goldstein）主張：「霸權有能力指揮命令國際政治中的各種規則和安排……，經濟霸權有能力控制世界經濟，政治霸權以軍事控制世界。」^(註一一)。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從新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霸權，認為「核心地帶的霸權國，控制邊錘地帶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文化。」^(註一二)

不管狹義廣義，雷根政府既遭遇衰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使美國富強，所追求的霸權正是政治軍事和經濟，陽剛加上陰柔，雙管齊下，併用在區域或者全球。

經濟和軍事，從長期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認為財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將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擴張過份，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銷了。如果這個國家正處於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困境將變得更加嚴重^(註一三)。

甬論雷根不懂得後半段的道理，至少他有前半段的見解。一九八一年五月，雷根對西點軍校學生講話：「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恢復美國經濟。」雷根第一任期，就將經濟列為首要目標，視經濟為國防建設的基礎^(註一四)。

雷根經濟，被視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或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註一五)。雷根政見，開出來的支票是一減少稅收、降低赤字、增加國防預算。按經原理，減稅減少開支，增稅增加開支，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再不然，增稅減少開支，有贏餘，自然降低赤字，現在雷根減稅增加開支，反而使赤字愈來愈大，怎可降低赤字？而雷根硬要以非經濟學原理，迎合民意。

雷根堅決主張減稅，「世上沒有一個國家，將稅增加到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註一六)「哈定總統減稅，甘迺迪總統減稅，聯邦政府的歲收，久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註一七)雷根常常告訴他的部屬，回教學者卡爾頓（Ibn Khakloon）說過：「古埃及王朝建國之初，減少課稅，卻增加大筆財富，即將滅亡的時候，加強課稅，卻收不到什麼銀子。」^(註一八)

兩任加州州長節稅成功，更增加他在這方面的信心。雷根已習慣減少、一政府不必要的開支，

p. 70.

註九：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2.

註一〇： Robert C. North and Julie Strickland, "Power Transition and Hegemonic success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aheim, Calif., March-April 1986), p. 5.

註一一：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81.

註一二： Immanuel M.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Essay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41.

註一三： Sec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reface 本書國內已翻譯，保羅·甘迺迪著，王保存、陳景彪等譯，世界強權的興衰，近代篇—西方霸權（台北：風雲時代，一九九二年版），頁一八。

註一四： Terry L. Deibel, "Why Reagan is Strong" op. cit., p. 111.

註一五： Ibid., p. 113; David A. 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p. 7.

註一六： R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p. 142.

註一七： Martin Anderson,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p. 331

註一八： Ronald Reagan, op. cit., p. 231.

儘量將剩餘的錢，退還給納稅人，甚至鼓吹州議會通過政府節稅修正案。他也讀過經濟學的論著，堅信：課稅會抑制生產，減稅才能刺激生產。

聯邦預算局局長史托克曼（Dave Stockman），爲了減少美國預算赤字，不惜聯合國會議員、新聞界、白宮高級官員，迫使雷根增稅^(註一九)。可是雷根不爲所動，「增加課稅不能平衡預算，它反而增加政府開支，減少私人投資……，我不准聯邦政府，踩在美國納稅人的背上，平衡預算，我要信守我減稅的諾言。」^(註二〇)

雷根是共和黨，有人認爲民主黨是國內繁榮，對外戰爭的黨，共和黨是國內經濟不景氣，對外和平的黨^(註二一)。研究冷戰圍堵戰略的歷史學家迦第斯（John Lewis Gaddis），從政治經濟來考量，發現民主黨自由放任，共和黨採取保守主義。民主黨杜魯門、甘迺迪、詹森總統時代，預算自由，大唱增加稅收和支出，傾向廣義的圍堵戰略，對美國使用武力持著樂觀的態度。共和黨艾森豪、尼克森、福特總統時代，大幅削減稅收和支出，審慎地選擇戰略目標和圍堵策略^(註二二)。

雷根兩任期間，擴張圍堵策略，卻削減稅收和支出，一反民主黨、共和黨的傳統作風。從戰略邏輯上看，雷根想要達到兩項目標：(一)降低風險（“risk-minimizing” strategy），(二)降低成本（“cost-minimizing” strategy），殊不知這兩項目標，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降低成本，就要冒很大的風險，承擔失敗的後果，要想贏得戰爭，就只有忍痛增加成本，戰費高昂，赤字劇增^(註二三)。尼加拉反抗軍和伊朗人質，都面臨戰略上相同的挑戰。

支持美國海外霸權，和爲分析雷根主義政策起見，有必要將雷根每年的經濟戰果表列^(註二四)如下：

表一 雷根任期前後聯邦歲入支出情形和 GNP 百分比

年度	%稅收	%GNP	\$支出	%GNP
1977	356	18.4	409	21.2
1978	399	18.4	459	21.1
1979	463	18.9	503	20.6
1980	517	19.4	590	22.1
1981	599	20.1	678	22.7
1982	617	19.7	745	23.8
1983	600	18.1	808	24.3
1984	666	18.1	851	23.1
1985	734	18.6	946	23.9
1986	769	18.4	990	23.7
1987	854	19.3	1,004	22.7
1988	909	19.0	1,064	22.2
1989	990	19.2	1,142	22.2

註一九： David Stockman, *op. cit.*, 1987, p. 455.

註二〇： Paul Craig Roberts, *The Supply Sid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02-203.

註二一： See Robert A. Divine, “War, Peace,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n,” *Social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 VIII (March 1977), pp. 1-6.

註二二：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 *National Interest*, no. 10 (Winter 1987-88), pp. 27-38 See also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55-356.

註二三： *Ibid.*, pp. 31-38.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分析美國國力和雷根外交政策的時候，也經常提到雷根總統的這種困境。 See Joseph S. Nye, Jr., “U. S. Power and Reagan Policy” *op cit.* 1982, p. 406. “Understating U. S. Strength” *Foreign Policy*, no. 72 (Fall 1988), p. 11..

註二四：轉引自 Edwin Meese III, *With Reagan: The Inside Story* (Washington, D. C.: Regnery Gateway, 1992), p. 150.

\$ 稅收支出以十億美元為單位。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管理預算局

Edwin Meese III, With Reagan: The Inside Story (Washington D. C.: Regnery Gateway, 1992), p. 150.

雷根政府分三次減稅，一九八一年減少百分之五，第二年百分之十，第三年一九八三年百分之十，從表一數據顯示，減稅並沒有影響歲入稅收的增加。歲入歲出，無論從美元和所佔 GNP 百分比看，長年以來，均是入不敷出，累積赤字為數可觀。

軍事費用究竟在總支出部份佔多少百分比？國防部長溫伯格（Cap Weinberger）估計，現代化戰略三戟飛彈，裝備新的彈道飛彈，汰舊換新B-52 轟炸機，重建海軍，改良戰術武器系統，加強核戰指揮管制和民防訓練，提高軍人士氣和戰鬥意志…等等預算，要佔總支出的三分之一^(註二五)。實際上歷年來國防真正支出，晚近都不到三分之一，從表二可以看出諷倪：

表二 1961-1991 美國國防佔聯邦預算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年度	百分比
1961	50.8	1981	23.2
1963	48.0	1982	24.8
1965	42.8	1983	26.0
1967	45.4	1984	26.7
1969	44.9	1985	26.7
1971	37.5	1986	27.6
1973	31.2	1987	28.1
1975	26.0	1988	27.3
1977	23.8	1989	26.5
1979	23.1	1990	23.9
1980	22.7	1991	20.1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管理預算局

See Casper Weinberger, “President Reagan’s First Defense.” Fighting for Peace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90), pp. 39-79.

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任內的國防預算，佔總預算的一半，雷根政府的只佔四分之一，不僅不及甘迺迪、詹森的預算，且不如尼克森和福特，但比卡特的好一點點，可見雷根軍事經費之短絀，甬論以經濟、軍事為基礎之霸權。難怪雷根的強權是一種泡沫，沒有實力基礎，其權力純粹是一種心理預期、心理作用：possunt quina posse videntur，即他們有權力，所以他們似乎有權力^(註二六)。也因為它是一種想像和虛幻的權力，而導致美國在伊朗軍售人質和尼加拉瓜反抗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欲振乏力，功敗垂成。

三、反共產主義

註二五：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s for Peace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90), II “President Reagan’s First Defense Budgets” , pp. 39-79.

註二六： See Terry L. Deibel, “Why Reagan is Strong” op. cit., pp. 112, 120-125, see also Alan K. Henrikson, “The Emana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6, no. 1 (Summer 1981), pp. 152-164.

雷根心理權力和虛幻霸權，既難顯現經濟軍事之實力，其所賴以爲生的是雷根本人的人格特質和強者形象，以及堅定的反共意志和對共產世界的全面聲討。

雷根樂觀進取、坦白直率、冒險犯難、勇敢果決、臨危不亂、寬宏大量、精力充沛、幽默風趣。他是天生的演員，最佳的談判者、溝通者，他懂得善待左右，接近民眾；嫻熟於聲光、媒體、銀幕、廣播，表情達意，傳達信息。他個子高大，肩膀寬厚，身穿牛仔，騎馬劈柴，一副男子氣概；子彈打不死，癌症難不倒，是個很傳奇性的領導者，美國人印象深刻^(註二七)。

聲討共產主義，是雷根另一個很戲劇性的作風。一九八一年他說：「歷來蘇聯領袖說慌、欺騙，無惡不作，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所以蘇聯是宗教和世人的眾矢之的。」^(註二八)一九八二年雷根在英國國會演講，話鋒一轉，出其不意，「把共產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之中」，並詛咒「蘇聯實驗必敗，共產政權必亡」^(註二九)。一九八三年指責「蘇聯共產主義是現代歷史罪惡的淵藪」^(註三〇)，一九八四年「邪惡帝國，就是那種我不是突然說到的那種事，它由來已久……，我想時候到了，該提醒他們，讓他們知道我所指的實際上是什麼。」^(註三一)。

雷根向來不喜歡共產主義，極力反對尼克森的美蘇「低溫和解」，和卡特的「人道世界秩序」。尼克森背後有季辛吉，卡特背後有布里辛斯基，他們都藉學術理論，反對冷戰、對抗、和圍堵。爲了反對尼克森和卡特之反對冷戰對抗，雷根也要找一套理論架構來支撐，幸好喬治城大學教授寇克派翠克 (Jeane J. Kirkpatrick)，在「評論」(commentary)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爲「專制獨裁和雙重標準」(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註三二)，可說沙漠甘泉，如獲至寶。是什麼理論吸引著雷根？

重點在世界專制獨裁國家有兩種：一種是左派共產獨裁，一種是右派傳統專制，左派泛指共產世界的所有共產國家，右派則尼加拉瓜的蘇慕薩、菲律賓的馬可仕、和伊朗的巴勒維政權等。美國經常面臨這兩種雙重標準的抉擇，整個七〇年代，尼克森、福特、卡特任內，相繼放棄南越、中華民國、伊朗、尼加拉瓜、阿富汗等友善親美的政府，一味投向共產政權的懷抱。在雷根看來，這是絕對的錯誤，因爲中國有句俗話「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民主是利，求取不得，奢談取其重；專制獨裁全是弊，相形下，左派共產之禍害，重於大於右派傳統之禍害，自然取其輕。因此，雷根勢必要放棄共產政權。

依寇克派翠克的見解，傳統專制可以忍受社會的不平等、殘忍、貧窮、和悲慘；而革命共產卻在創造所有這些不幸。

傳統專制在分配社會財富、權勢、身份地位、和其他資源上，將絕大部分的好處留給少數權

註二七： Terry L. Deibel, "Why Reagan is Strong" op. cit., p. 112; 一, "Regan Mixed Legacy" in *Foreign Policy*, no. 75 (Summer 1989), pp. 49-51 emphasize "Roagan's Public Leadership"; Edwin Meese IV, op. cit., Chapt. 2 "Reagan as Leader", pp. 24-26. 其他像溫伯格等追隨過雷根的内閣閣員和部屬，在他們的書和談話中，均提到雷根幽默親和的人格特質，白宮發言人史匹克斯 (Larry Speakes) 將他服務過的六屆總統做一評價，並列等依次如下：雷根、尼克森、詹森、甘迺迪、福特、卡特，可見雷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參見Larry Speakes, *Speaking Out: The Reagan Presidency from Inside,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8), pp. 301, 308-309。

註二八：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81.

註二九： Strobe Talbott, *The Russians and Reag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pp. 89-104.

註三〇： *Ibid.*, p.113

註三一：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1984.

註三二： See Jeane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 &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November 1979)後來與 "U.S. Security & Latin America" . *Commentary* (January 1981) 一起收錄在Jeane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 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2).

貴，使絕大多數的百姓陷於貧窮困境中。貧窮大眾，靠著宗教的信仰和各種禁忌的遵守，習慣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於他們的生活起居，以及家庭鄰里人際關係的和睦相處。他們早已熟習貧窮疾病，忍受著「大地以蒼生為芻狗」的命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環境，不太會製造大量的逃亡難民。

逃亡難民發生於共產國家，共產政權控制著社會的每一個生活層面，甚至要改變百姓內心深處的思想、價值、觀念、態度、和信仰。爲了鞏固政權，不惜整肅異己，抄家滅祖，誅連黨羽，製造仇恨。借各種政治運動，否定傳統，否定憲法，否定基本人權。大陸淪陷，越南解放，難民潮不斷，按估計，一九七八年年底，從共產國家逃亡的難民就有六百多萬，他們不怕圍牆、鐵絲網、槍砲、電網、溝壕。被遣送回去，想盡各種辦法逃亡^(註三三)。

卡特嚴重的錯誤，是選擇左派共產政權，捨棄右派專制傳統，視友好舊政權國家爲現狀罪惡的代表，把不友好左傾國家的勝利，當成有利於美國國家的「真實利益」。卡特這種雙重考慮、雙重標準，破壞了美國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政策以人道、人權、道德爲基礎，到頭來，換來的是最爲人詬病的虛偽，根本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註三四)

卡特之所以如此，或者其政策之所以失敗，導因於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周圍的一群策士。在寇克派翠克的心中，不僅他們帶壞美國，反冷戰的季辛吉和尼克森，也都難辭其咎。

雷根喜歡寇克派翠克點破美國外交政策的困境和兩難，而且在經「獨裁和雙重標準」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爲美國找尋一條出路，那就是唾棄共產政權，此觀點和雷根的看法不謀而合。既要唾棄共產，就只有批判布里辛斯基和李諾維茲委員會（the Linowitz Commission）等的理論和論調，以下是寇克派翠克對他們的微詞。

卡特總統一上台，繼續尼克森時代的思潮，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朝野上下爭相質疑，美國爲什麼要恐懼共產主義？爲什麼要東西對抗？長久以來，將美國武力投入無底洞的深淵，美國過去的政策是不是錯了？他們從越戰中得到教訓，咸認爲冷戰過去了，共產黨不會再爲非作歹，以武力干預他國事務本身，既不道德，也不切實際，不應該再支持君主專政和反對「民族解放」這種對共產主義心存幻想的氣氛，一直籠罩著整個七〇年代。

袒護共產國家的氣氛相當濃烈，其推波助瀾，人爲的因素佔絕大部分，遠的季辛吉不說，卡特任內的布里辛斯基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一九七〇年，布里辛斯基出版「兩代之間：美國在資訊電子時代所扮演的角色」（“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1970）^(註三五)，借著「現代化」的概念和「社會變遷」理論，說明兩代之間的差異。

現代化指一個傳統的、科技前期的社會，過渡到機器、技術、理性、世俗、高度分化的社會^(註三六)。這個概念界說，具有兩點特性：第一變遷的過程。正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它是一種深沈的、全球的、大規模的、長期的、自發的、不可抗拒，可欲的變遷^(註三七)。第二，目的論。布里辛斯基引用亞里斯多德目的論的觀點，謂整個時代的、歷史的潮流，其目的

註三三： *Ibid.*, pp. 49-50.

註三四： *Ibid.*, p. 43.

註三五： Zbigniew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0).

註三六： James O’ Connell,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in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Cyril E. Black,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6), p. 13.

註三七：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III (April 1971), pp. 283-322.

發展到最後，必然是好的、道德的、進步的。^(註三八)

世界在變，共產國家變好，第三世界會變得更好；美國國家利益變，外交政策也要跟著變遷調整。面對科技、理性、進步的未來，美國應多點人性、人道、人權，揚棄勢力範圍、軍事同盟、意識型態對抗、核武競賽等舊時代國際政治系統架構^(註三九)。

李諾維茲委員會，為美國拉丁美洲國家委員會，由李諾維茲教授（Sol Linowitz）領導，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克拉克基金贊助，成員來自美國社會各階層，是個獨立機構。

委員會的觀點，受到布里辛斯基影響。在完成的兩篇報告中，第一篇提到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從門羅主義、善鄰政策、進步同盟、到成熟夥伴，美國理應減少干預，尊重主權，忍受政治、經濟差異。^(註四〇)第二篇報告建議卡特政府，簽訂巴拿馬運河條約，與古巴關係正常化，貿易自由化，援助國際化，促進人權，不再以第三世界作為冷戰的戰場。^(註四一)

委員會和布里辛斯基很烏托邦，理念均深具理想的色彩，認為凡是對世界有益，就是對美國有利；美國只能講道德，不能談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美國政策目標，都是一些很抽象，超現實的「人權」、「發展」、和「公道」權力在為道德服務，用來懲治破壞人權的國家，並避免古巴和共產附庸受到暴力和恐怖行動的傷害。權力不在保護美國海外公司和商業貿易的來往，亦不在維持美國戰略利益和國防安全。

卡特除了採納布里辛斯基和李諾維茲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之外，拉丁美洲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atin America）也有一份報告，重申委員會第二篇報告的重要性，並強調：第一、美國要一掃過去的優越性、稱霸和超強，因為它不僅過時，而且道德上也久被接受。第二、與古巴關係正常化之外，美國更要接受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實驗途徑。承認開發中國家需要改變，改變的原動力不應忽視。第三、鎖定人權，絕不容許人權疲破壞^(註四二)。

寇克派翠克認為卡特旗下的國家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美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Andrew Young），拉丁美洲政策研究所的帕斯特（Robert Pastor）、史涅德（Mark Schneider）等為新左派、新自由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全球主義、反美的急進主義^(註四三)，不合美國國情。

卡特禁止政府破壞人權，就不禁止恐怖份子、游擊隊違背人權。人權究竟是個人權、法律權、政治權、經濟權，還是國際特赦組織（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使用的，免於刑求、強制監禁、逮捕的權利？說法不一，國務院人權推廣處，執行困難^(註四四)。

雷根當選後，便延攬寇克派翠克入閣，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不僅參與制定拉丁美洲國家政策，並且側重對第三世界共產政權的防範，和民主制度的推行。雷根也委託季辛吉，成立中美洲兩黨研究委員會（National 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 1983），重估中美洲情勢，拉丁美洲做全方位的探討，以為第二任政策制定的參考，所做報告為伊朗反抗軍事件埋下伏筆。

註三八：Aristotle, *Politics*, 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50-51.

註三九：Brzezinski, *op. cit.*, p. 274.

註四〇：The Americas in a Changing World,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October 1974.

註四一：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Next Steps, report by 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December 20, 1976.

註四二：The Southern Connec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pproach to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Ad-Hoc Working Group on Latin America,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 program of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977), pp. 3-6.

註四三：Jeane J. Kirkpatrick, "U.S. Security and Latin America" in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p. 60.

註四四：Ibid. p. 63.

(註四五)

大體上，雷根的反共國策：(一)堅持冷戰，東西對抗，堅信自由必勝，暴政必亡。(二)以實力追求和平，認為衰弱、妥協反而擴大蘇聯侵略的野心，(三)除了武裝，蘇聯別無所有，經濟瀕臨破產，共產國家已面臨維持帝制和解決國內問題的困境。(四)再度投入反共行列，重建國防，援助反共國家。(註四六)

四、反恐怖主義

恐怖份子濫殺無辜和劫持人質，對雷根政府和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很大的威脅。一九八三年貝魯特爆炸案，炸死美國海軍陸戰隊二百四十一人，同年科威特美國和法國大使館爆炸，恐怖份子十七人被捕。一九八四年被劫持的人質分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貝魯特站長巴克萊 (William Buckley)，為黎巴嫩回教聖戰組織所為，以及維耳神父 (Rev. Benjamin Weir)、美國貝魯特大學柯伯因 (Peter Kilburn) 教授。一九八五年則為建科 (Rev. Lawrence M. Jenco) 神父、美聯社記者安德森 (Terry A. Anderson)、美國貝魯特大學醫學院院長賈可賓遜 (David P. Jacobson) 和舒澤男 (Thomas M. Sutherland) 教授，以及劫持八四七波音客機 (TWA flight 847) 和阿契羅郵輪 (the Achille Lauro)。一九八六年另有李德 (Frank Herbert Reed)、布西匹歐 (Josph James Cicippio)、崔西 (Wdward Austin Tracy) 三個美國人被劫持。

雷根主義在反恐怖主義的層面上，是在保護美國政府和人民的生命財產。美國賓州大學兩位教授拉賓斯坦 (Alvin Z. Rubinstein) 和史密斯 (Donald B. Smith)，曾對這些現象做過一系列研究，他們認為恐怖主義是反美主義的一種現象，猜忌、憎恨、污蔑、敵視美國政府、政策、文化、和社會，這種情緒普遍存在於亞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國家(註四七)。

反美情緒依程度表現出幾個面向：(一)態度—老百姓、精英對美國政府和人民感到痛恨、不恥、厭惡、同讎敵愾，只埋在心中，沒有表達出來。(二)輿論—借著演講、寫作、廣播、電視，公然謾罵、嘲笑、抨擊美國政府和人民。(三)示威遊行—大多數人民，不管有組織、沒組織，聚集公共場所靜坐、示威、遊行，喊口號、貼標語、廣播、唱歌、演講、請願……。(四)動以干戈—暴動，攻擊美國大使館、領事館、文化中心、新聞處、圖書館，劫持美國政府官員，在電視機之前炫耀，暗殺爆炸層出不窮。參加的人員由政府官員、秀異份子、到群眾。

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朗，表現極高昂的反美情緒，下面四種反美主義中，伊朗反應最為強烈。拉賓斯坦和史密斯歸類出來的反美主義(註四八)分別是：

問題取向的反美主義 (Issue-oriented Anti-Americanism)。對世界某些爭議的問題，反對美國。如過去三十七年，美國經常發現，印度對美國援助巴基斯坦、印度不結盟政策、印度割讓 Goa、美國 Diego Garcia。軍事基地、蘇聯入侵阿富汗等問題格格不入。

意識型態反美主義 (Ideological Anti-Americanism)。當代第三世界意識型態反美主義約計民族主義、馬克斯主義、回教正流主義三大主流，民族主義最為普遍，通常和後二者結伴同行。馬

註四五： Henry A. Kissinger,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National 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註四六： Edwin Meese III, op. cit., p. 169.

註四七： Alvin Z. Rubinstein and Donald B. Smith, "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 in ORBIS, vol. 28, no. 2 (Spring 1984), p. 593. 這邊文章收集在兩位教授合編，即將出版的新書裡頭，名為 *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forthcoming from Praeger).

註四八： *Ibid.*, pp. 604-611.

克斯主義是用來對抗美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拉丁美洲國家就是拿它抵擋美國在西半球稱霸。回教正流主義剛崛起，方興未艾，銳不可當。

工具反美主義（Instrumental Anti-Americanism）。反美經常被利用為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技倆不外為：(1)假民族主義之名，贏得群眾的支持，(2)將反對勢力打為左派，(3)將政府失敗歸罪美國，(4)投靠蘇聯共產集團，視為合理正當。

革命反美主義（Revolutionary Anti-Americanism）。革命反美主義起源於意識型態的反美主義，一旦推翻親美政權，意識型態反美主義即成為革命政權的主義教條，然後將它推銷到其他國家。伊朗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屬於這種革命反美主義，美國政府支持專制統治的巴勒維和蘇慕薩王朝，導致反美，和舊王朝統治者的垮臺。

四種反美主義，依照參與者參與程度的深淺，從表三可以看出，問題取向和意識型態反美，群眾都沒有參加。伊朗和尼加拉瓜革命反美，政府、精英、群眾成為革命的主要行為者。其他類型，政府、精英、群眾有時候扮演次要的角色。

表三反美主義類型

參與者 類 型	政府	精英	群眾
問題取向	○	△	
意識型態	△	○	
工具反美	○	△	△
革命反美	○	○	○
註：○主要行為者 △次要行為者			

雷根政府面對伊朗、尼加拉瓜激烈的反美情緒，特別是伊朗回教意識型態結合革命，已惡質化為恐怖主義，美國要如何杜絕這種恐怖行動的孳長和蔓延？應該從美國的全球政策、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美國在第三世界的經濟活動、美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做全面的檢討。

美國的全球政策：即美蘇對抗，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眼中，是極其不道德的行為，因為它以鄰為壑，傷及無辜，不結盟政策即在對抗兩大超強全球性的權力鬥爭。

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1)防止第三世界淪為共產主義國家，(2)確保第三世界忠於軍事同盟，(3)穩定美國戰略軍事基地，(4)促進結盟不結盟國家經濟發展，(5)支持親美政權，(6)推翻親蘇反美的左翼政權。第三世界國家認為美國是假借和平、經濟發展、人權、民主之名，行美帝國主義侵略之實。

美國在第三世界的經濟活動：第三世界國家認為美國政治與經濟相互為用，以確保美國在第三世界的霸權，因此美國外交政策服務多國公司利益，多國公司又成為美國政府海外政治統治的代理人。多國公司口口聲聲資本轉移、技術轉移、訓練管理人才、專業人員，增加就業機會，達到經濟發展，有利於地主國。第三世界認為這些經濟活動在剝削他們國家的資源和人力，造成回天乏術的政治和經濟依賴，真正受到好處的，只有少數的統治者和代理商。

美國社會價值取向：美國好萊塢電影、搖滾樂、普羅藝術、牛仔褲、麥當勞速食店、電視肥皂劇的性和暴力、政治急進暴烈、青少年販毒吸毒、社會自由放任、性泛濫、個人急功好利、利慾薰心，物質主義、世俗化、消費主義充斥，嚴重危害到傳統價值和道德權威。柯梅尼回教革命，攻擊美國這個大撒旦^(註四九)。

不論那方面，其實絕大部分都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要雷根政府放棄，很難，即使雷根放棄，美國人也絕不容許。治療恐怖主義，既不能削足適履，就只有退而求其次，求技術上的突破。綜上分析，吾等得到下面幾點結論：

第一，雷根主義多樣性，融和了霸權主義、反共主義、反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政策目標導向，三者缺一不可。以本末言，霸權主義為本位，為基礎，反共產主義和反恐怖主義為次要、為末梢。以歷史上出現的優先順序言，霸權主義在先，其次反共產主義和反恐怖主義在後，反恐怖主義趕時髦，反共產主義則推陳出新。以目的言，霸權主義在反求諸己，反共產主義在撼搖全球共產政權，反恐怖主義在面對第三世界反美之挑戰。

第二，雷根主義的理論基礎，恒借學者的理論論著。霸權主義著力於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美國國力和雷根政策」，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帝國興衰史」，獨雷根經濟學革命和冷戰圍堵戰略歷史學家迦第斯的研究頗有出入。反共產主義植基於喬治城大學教授寇克派翠克「專制獨裁和雙重標準」，反對布里辛斯基的「兩代之間」和李諾維茲委員會的報告。反恐怖主義則借重賓州大學拉賓斯坦和史密斯兩位教授的全套研究「第三世界反美主義」，以為立論的依據。

第三，雷根主義有其深厚的理論依據，也有其誕生的時代背景。美蘇經濟軍事勢力逐漸衰退，不再是兩超強為世界政治權力核心的時代，東亞四小龍，第三世界風起雲湧，蘇聯共產集團，紛紛解體，毋須雷根主義之反共產主義的虛張聲勢。任內前四年，有大敵抗衡，可撐起國力表面張力，後四年像洩了氣的皮球，欲振乏力，再加上學者專家憂國憂民，數據一再顯示，雷根的強權和霸權主義，是一種泡沫、想像和、虛幻，心理作用罷了，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因此也抗衡不了第三世界的恐怖主義政策。

註四九： *Ibid.*, pp. 595-603.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agan Doctrine

Hsiu-Chu Hong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agan Doctrine which is built upon pro-hegemony, anticommunism, counterterrorism as well as Reaganomics. Reagan Doctrine represents a clear strategic departure from the Carter years and exhibits the administration's determined use of American power to defend the country's interests. For Reagan, reversing America's decline means recovering hegemony of American Power, especially the rejuvenation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his favorite foreign policy tools. Anti-commun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campaign is Reagan's effort to restore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o counter the rise of Soviet military power and confront the anti-Americanism demonstration of pro-terrorism third world government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theory of Reagan Doctrine exists its priority, a lot of them adopt from various suggestions and critics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 whole theory creates for American people a psychological power phenomenon, particularly Reaganomics so-called woodoo economics brings with the Reagan revolution.

Keywords: Reagan Doctrine, Hegemony, Anti-communism, Counter-terrorism, Anti-Americanism, Reaganism, woodoo economics, supply-side economics, Reagan revolution